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研究专注于哪些议题?取得哪些成绩又存在哪些不足?未来的研究方向何去何从?围绕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灵芝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耿协峰教授。耿教授主要从事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代表作包括专著《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译著《国际思想大师》《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等,以及论文《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未来挑战》《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十大争论及其进展》等。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

——耿协峰教授访谈

耿协峰 陈灵芝

一、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总体评估

陈灵芝(以下简称“陈”):耿教授您好,您可否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地区

主义研究的总体情况？

耿协峰(以下简称“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开展全方位交往、联系和互动的客观进程与趋势。伴随着这种全方位、整体性全球化的,还有另一股地区化新浪潮。作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局部的全球化进程,地区化的发展催生了地区主义。概言之,地区主义就是指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人类群体之间在地区层次上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互动的一种特殊实践(包括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地区治理)及其思想表现。于是,对这种特殊实践及其思想表现进行的学术研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地区主义研究”(Regionalism Study)。

无论在外国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地区主义研究都是一个新的学术知识增长点。国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地区主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诸多社会科学分支领域(如欧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中的“一个新兴学术产业”,如瑞典学者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Fredrik Söderbaum)所言,地区主义研究“已经进入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① 在中国,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地区主义研究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一度崛起为中国国际关系学领域里一支新的“偏军”。^② 同时,有关学者积极主张要确立中国视角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地区主义研究学术领域。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一度吸引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关注,催生过一批批内容丰富且不乏新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同时也为一届届研究生学子提供过激动人心的新鲜主题。30 多年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立足亚洲实践和中国经验,充分吸收域外理论养分,基本确立了自身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话语空间,在理论构建和方法工具方面也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尝试,已经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一直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一开始就采取“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融合经济地理

^①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5.

^② 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页。

学、文化人类学、全球史学、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等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努力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①如今,地区主义研究的国际学术景观又有新的变化,开始集中呼吁“超越新地区主义”而“重新思考地区主义”,并致力于打造一个相对独立的“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新领域,以更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视角,跨越不同地区和政策领域进行“真正的全球比较研究”。^②对此,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积极响应,并与中国当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领域产生强烈共鸣和交叉互动,开始努力推动构建一个既有全球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新领域。

陈:在您看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在成长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的发展?各有何特点?

耿: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构建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本人曾根据中国知网(CNKI)文献对最近30年(1991—2020年)间的中国地区主义学术史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三个十年期,分别是创生期(1991—2000年)、起飞期(2001—2010年)与平台期(2011—2020年),而且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学术发展特征,总体上可分别概括为除旧布新(创生期)、开放包容(起飞期)和比较转向(平台期)。^③如今,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继续在成长发展。概括而言,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在这三个阶段直至当前的学术发展分别体现出以下特点。

在创生期(1991—2000年)内,受世界上地区主义复兴潮流和中国参与地区合作实践的驱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破土而出,第一批地区主义研究者主张摒弃各种旧地区主义观念,而致力于新地区主义的研究,体现出鲜明的除旧布新特征。除旧布新的“新”不仅体现在学术观念更新上,还体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空间的创新拓展上。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原本不乏对地区主义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但长期停留在对西欧和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上,一度主张建设中国的

^① 耿协峰:《当代国际研究中新地区主义理论整合方向初探: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论坛》2001年第1期,第58页。

^②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4; [德]塔尼亚·A.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③ 关于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学术史的详细述评,参见耿协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54—86页。

“欧洲学”，^①其中以引介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成果和评述欧洲一体化实践为重心，以至于长期轻视和忽视了研究亚洲本地的地区主义实践，对于欧洲之外其他南方地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的地区主义实践明显重视不够。自 1991 年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一个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于同年与东盟建立正式对话伙伴关系后，中国学术界才逐渐跨出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小圈子”，开始进行更大范围的“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理论研究。与此同时，有关“亚太学”的学科建设努力也开始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领域一道比较亮眼的学术风景线。^② 总之，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之中，中国学术界创新拓展了解读和论证地区主义实践的新空间，从而催生了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

在起飞期（2001—2010 年）内，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取得重要进步，甚至出现“井喷式的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地区主义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除了以王逸舟、秦亚青、张蕴岭为代表的中生代学术带头人的积极倡导、激励和参与外，开始出现一批青年骨干学者，涌现出一批学术作品（包括引进作品），学术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开始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启迪，促使中国政府制定更加“自信、坚定、具体、深入”的地区主义战略策略。^③ 在此期间，中国学人立足中国和亚洲实际，面向全球，兼收并蓄，既拥抱“开放地区主义”的政策主张，又容纳不同立场观点，围绕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制度建设和共同远景目标开展了广泛的争论，推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迅速进入高潮，并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总

①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载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 页；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欧洲》2001 年第 1 期，第 1—2 页；刘立群：《“欧洲学”刍议》，《欧洲》1995 年第 4 期，第 79—81 页；沈雁南：《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学术界》2000 年第 5 期，第 87—96 页。

② 建立中国“亚太学”的倡议最早由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常务副会长陈鲁直先生于 1993 年提出，而较系统的倡议则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峰君先生于 1997 年在其著《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代序文中正式提出，并做出了持续 20 多年的不懈探索和努力。陈峰君在其题为《建设跨世纪的新学科：当代亚太学（代序）》文中提出：从狭义上说，“亚太学是一门超越地域、国别，横跨各类社会科学的大型综合性学科”，具有“跨学科性、宏观性、理论性和现实性”；而广义上说，“亚太学”可分为四个层次或四级学科，即第一级亚太总体学（即综合分析），第二级按学科分为亚太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发展学、国际关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民族学等，第三级按地区分为东北亚学、东南亚学、南亚学、南太平洋学、北美学等，第四级按国别分为中国学、印度学、日本学、韩国学、朝鲜学、泰国学、马来西亚学、印尼学、新加坡学、越南学等。参见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 页；陈峰君：《亚太崛起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 页。

③ 翟崑：《亚洲新千年之中国编年史：新亚洲主义》，《世界知识》2007 年第 12 期，第 62 页。

体特征。

在平台期(2011—2020年)内,受国际形势深刻转变的影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整体学术生态有所改变,总体趋势呈现为热度下降,尤其是对东亚或亚太地区的关注有所减弱,批评和反思增多,但地区主义相关文献数量仍保持在一定的高位数,议题分散却有明显拓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平台期的主要特征并非“停滞”或“衰落”,而只是遇到“成长中的烦恼”,需要对前一时期的开放包容的研究内容进行实践对照和学术消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尝试寻找新方法、寻求新突破。严格说来,这一时期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总体特征应概括为“平台与转型”,虽说总体上平缓发展,但又转向比较,议题拓展、多方并蓄,研究更为精细化。更重要的是,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国际学术界有意识地将比较地区主义构建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逐渐出现新的转型发展趋势。

当前,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开始全面转型,积极跟进国际学术发展趋势,反思自身学术史,组建学术共同体,并积极与全球学和区域国别学等新兴学科共变协进、交叉融合,在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上努力创新,出现了明显的“三大转向”即“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所谓“全球转向”,主要是在21世纪初以来国际上新兴三大学科倡议——全球史、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共同推动下出现的。全球转向的理论意义主要是,开阔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视野,令其彻底摆脱了“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等种种旧观念的约束,从而能够在“一个真正多元主义的全球秩序概念”基础上进行全球比较研究;实践上则主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处理“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和实践“地区自主性”,尽管仍然需要警惕种种“逆地区化”现象。所谓“治理转向”,是指受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欧盟研究中“治理转向”的影响,将研究对象从过去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转向“地区治理”,突出了相关议题领域治理的重要性,并且议题范围广泛涉及地区安全、地区贸易、地区货币金融、地区发展、地区社会、地区环境、地区移民和地区公共卫生等,大大扩展了地区主义研究对象的范围,丰富了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治理”概念的引入,有效克服了过去地区主义研究中对于地区化层次高低和地区主义程度大小的僵硬对比,不再拘泥于制度化水平、一体化程度,而聚焦于治理的效率(有效性)和

影响(后果),从而使得更多地区、更广领域的内容具有了可比性。所谓“比较转向”,就是受国际学术界构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的影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者也开始有意超越新旧地区主义之争,同时也超越传统的欧亚二元比较或欧美亚三元比较,超越任何狭隘主义而进行“真正的”全球比较研究。其中,比较分析在地区主义研究中运用得明显更加广泛,以至于成为其最重要的“核心特征”。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将成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普通案例而不再是“特例”,而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合作将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和研究。

二、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与特色

陈:21 世纪以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生期内,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摸索前进,主要聚焦于新旧地区主义之辨、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间关系、“开放的地区主义”这样的理论议题开展争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快速发展,除了在这些议题上继续有所争论外,更多地聚焦于东亚共同体、地区主义的欧亚比较、地区间(区域间)主义、东亚秩序、地区制度复杂性、区域性公共产品和互联互通等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议题上。围绕所有这些议题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展现了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整体面貌和丰富动态,对此,本人曾做过详细的梳理和评析^①,这里再简单地予以概括和说明。

“地区主义新旧之辨”始于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创生之初,旨在解决观察和研究地区主义现象的视角问题,也包含着人们在地区主义性质判断、历史源流追溯和发展阶段划分上的不同看法。“新地区主义”是当时人们热衷于使用的概念,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地区主义的时代新特点展开讨论,指出其具有“提倡外向性、实行多边主义、补充全球主义、强调‘多样性’、倡导‘地区优先’”等诸多新意和新质,是“在新形势下对新问题的新应对和新反思”,^②从而在研究对象、主题和理论探索上都与“旧地区主义(旧区域主义)”有所区别。进入 21 世纪后,更多学者在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和东亚地区合作的背景下广泛采纳“新地

^① 耿协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十大争论及其进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168—182 页。

^② 张振江:《区域主义的新旧辨析》,《暨南学报》2009 年第 3 期,第 101—108 页。

区主义”(或“新区域主义”)之说,并且鉴于国际学术界提出超越新旧地区主义之分而建设比较地区主义,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也应超越新旧地区主义的比较和争论,大力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地区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①

“全球主义—地区主义—民族主义”三者间关系问题是中外地区主义研究中的“经典之辩”,甚至在进入比较地区主义阶段后仍受到学界密切关注。相关讨论充分反映了人们在看待全球、地区和国家三种层次的世界变动及其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观念和道路分歧。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术界已形成一定共识,大多认为三者间存在着战略性张力和关联,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地区主义在其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不过,有关三者间关系的争论仍持续存在,当前主要聚焦在全球治理、地区治理与国家治理三者间关系上,对于如何统筹、协调和平衡它们,不仅关乎理论争辩,更是政策选择难题,因此仍不时掀起波澜。

始于创生期对于“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学理讨论引发了持久的学术争鸣,一开始围绕这一亚太经合组织基本合作原则进行讨论,后来又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是否应该奉行这一原则展开辩论。相关争议的持续与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东亚地区合作发展路径和方向带来的困惑发生关联,从而导致学术界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日益失去信心,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进入平台期后出现“衰落论”的某种源头。直到2014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才有学者感觉到“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回归,并建议“重构开放地区主义的基本原则”。^②如今随着全球治理的地区化转向,对“开放地区主义”的解读仍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和政策话题。

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高潮期十年间,学术界主要又围绕“东亚共同体”“地区主义的欧亚比较”以及“地区间(区域间)主义”等议题进行探讨和争议。特别是“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一度也成为东亚各国共同重视的政策议题。自“10+3”机制诞生与东亚展望小组报

^① 当下中国学界又偶见一种看待新旧地区主义之分的“新偏见”,就是将一些明显属于“逆地区化”的现象,如英国脱欧、“民主十国”“印太四国安全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贬称为“新区域主义”或“‘新’新区域主义”,如此就难免有概念错置之嫌,需要予以分辨和纠偏。相关辨析和评论,参见耿协峰:《全球化进程中的逆地区化现象透视》,《人民论坛》2022年第21期,第98—102页。

^② 韩爱勇:《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地区合作的新路径》,《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第43—49页。

告提出“走向东亚共同体”建议之后,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开始聚焦东亚合作。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召开前后,“东亚共同体”更成为空前热门的学术话题,研讨异常激烈,不同倾向的观点纷呈,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学者对东亚共同体建设这一议题的完整性。自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中国学术界对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讨论转向对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或“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从而使“东亚共同体”议题的讨论走向长期化。

“地区主义的欧亚比较”和“地区间(区域间)主义”是两个学术性更强的话题,均明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但也与中国日益重视参与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的对外实践密切关联。鉴于欧洲是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发展最为成熟和发达的地区,而亚洲是中国所处的地区,中国很早参与了像亚欧会议这样的地区间主义合作进程,因此,中国学者就特别重视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的欧亚比较,偏好考察“欧洲经验”或“欧洲模式”是否适合亚洲实践等问题。虽有学者注意到欧洲与亚洲(或中国)采取的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模式具有共性内容,但对于二者差异性的比较仍然是主流,过于强调欧洲模式与亚洲模式(及中国模式)的差异,从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地区主义比较研究的视野。不过在这一时期,规范性的比较分析方法开始被引入,包括“比较历史分析”“比较案例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及“建立模式”的比较分析框架等,为下一阶段全面转向比较地区主义打下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进入“平台期”以来,有关学术讨论和争论的议题走向深入和细化。围绕宏观议题如“东亚秩序”的学术讨论仍然大热,一度成为引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大论题,但更多的研究聚焦到具体实际的制度建设上,如“地区制度复杂性”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问题,以及区域性“互联互通”建设问题。

“地区制度复杂性”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崭新课题,源起于对东亚合作“制度过剩”的质疑,借助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范式来解释“国际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问题,并在借鉴国际制度互动理论、过程建构主义和实践理论等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均势”“制度制衡”或“软性制度主义”“制度实践”等论说,认为地区制度复杂性可以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推动力,甚至是东亚地区秩序和平变迁的特色表现。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地区制度复杂性”的学术讨论与有关“区域性公共产品”“互联互通”的学术

讨论一样,与中国主流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研讨进展结合紧密,从而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衰落论”,未来仍将沿着这样的学术路线不断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对上述十大学术论题的研究成果,虽不能够涵盖21世纪以来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全部进展,但却足以构成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学术成果的主体和骨架,应当成为未来任何相关研究推进和创新的“前人肩膀”和“进阶之梯”。

三、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的问题和不足

陈: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地区主义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

耿: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一直存在概念不清、术语混用等现象,存在因研究对象不明确而导致的“盲人摸象”效应。此外,我认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有以下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

一是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时存在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现象。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来基本保持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性,这与及时引进国际学界的最新成果分不开,但显然存在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问题。比如,在没有充分理解引进的一些新概念如“新地区主义”“开放的地区主义”“地区性(区域性)”等之前,就千篇一律地将其应用于不同地区的经验案例研究当中,颇有“为发表而发表”之嫌;简单地套用国际关系学中流行的“三大主义”对地区化现象进行不同解释,然后分别指出其缺陷,但又不能提出新的可信解释;不加批判地对待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智慧”,如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以之度量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实践,认为欧洲的地区主义水平高而亚太和东亚的地区主义程度低,其实两者不可简单对比,且事实上西方学术界早已开始修正对非西方世界的陈见,表现出将欧洲经验“地方化”(provincization)的理论勇气;对于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超国家”观念做出“国家中心主义”的解读和批评,而不是进行面向全球化新现实的理解和吸收,甚至以维护国家的作用为借口固守“国家中心主义”偏见,以维护主权为理由无视主权面临的空前挑战;对国际上一些地区主义经典作品,虽然有颇高的引用率,但往往都是间接再间接的引用,难免存在断章取义、误解误读等情况,非常不利于学术的规范化和学术的传承与创新,等等。

二是存在重对策、轻理论的偏向。在这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在理论建构方面出现了一些成果,比如秦亚青等学者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和关系理论、王正毅的“边缘地带发展论”、陈玉刚的“国家之外主义”和超国家治理理论、耿协峰的“结构互动论”、周方银的“东亚二元格局论”、樊勇明等人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任晓的“东亚共生体系论”、魏玲的“发展地区主义论”、郑先武的“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论”、张云的“区域建构论”、顾炜的“双重结构论”等。然而,统观整个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重对策、轻理论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经验分析和对策分析性质的文章仍占绝对多数,涉及大理论或中观理论分析和构建的研究不多。同时,对西方理论的食洋不化、低水平重复,也导致理论建设工作与政策实践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容易招致耽于“主义”求索而忽视“问题”研究的诟病。如何结合实践创新理论,仍将是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领域今后不断探求的重要难题。

三是存在视野狭窄、研究碎片化的迹象。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缺少对地区社会文化合作研究的重视,而且明显不够重视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长期观察和研究的问题领域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对社会文化合作的重视明显不够。尽管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是地区合作的最重要方面,应该高度重视,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两大领域的话,难免视野狭窄。社会文化合作关系到地区知识结构的变迁,涉及科技、教育、大众文化、卫生健康、环境、移民、数字和网络空间等诸多领域,是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第三大支柱,发展潜力巨大,需要深入开掘。此外,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过分关注欧洲与东亚的地区主义,对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关注不够,也较少关心南南地区主义之间的联系和比较,致使研究碎片化,未能形成更具普遍性、科学性和规律性的认识。

四是耽于描述、忽视规范性比较。中国地区主义学者的“比较”意识萌芽较早,但查阅现有文献,发现大量文献是进行地区合作历史进程和现状跟踪描述的,即便是借用理论解释现实,也只是对现实发展和走向是否符合或违背理论加以简单检验,很少采用规范性的比较分析方法,更鲜有能从比较研究中创新理论的情况。起飞期及之前,也常见到对于地区的开放或封闭、制度的强或弱、合作水平的高或低、欧亚地区合作或一体化等进行比较分析的情况,但系统规范地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学术作品则十分罕见。在平台期内,虽然陆续

有部分学者重视地区主义的规范比较,但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相对国际学术界而言,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也远不够多。

五是学者们偏好各自为战、交流不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按照学界通行的理解,“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①一个好的、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应当能够实现“共谋资源、共享机遇、共同发展”。^②在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过非常重要的努力,比如王逸舟教授一度借助《世界经济与政治》平台,刊发大量地区主义主题的学术译文和论文,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如2008年“东亚共同体:制度构建与区域认同”研讨会),并推动专题学术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提倡研究生以地区主义为主题进行学位论文写作,这些促使中国地区主义研究队伍一度蔚然形成“偏军”——事实上的学术共同体。可惜的是,这个学术共同体持续时间不长,进入平台期后更是队伍松散、研究碎片化。又如,宋新宁教授等人曾于2009年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心”,并主编出版过一套丛书——“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丛书”(约出11种,其中包含国内第一本以“比较地区主义”为题的专著),遗憾的是,这个研究中心也缺乏持续性,没有发挥预期的影响力。近几年,国内部分学者和出版者共同发起了“比较地区主义圆桌论坛”年会,组织国内年轻学人开展专题研讨,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山东大学(威海)举办了四届年会(2021—2024年),今后仍需持续举办,慢慢聚集研究力量,才有望推动中国地区主义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和壮大。

四、国外学界关于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

陈:目前,国际学术界在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的进展如何?

耿: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区主义学术传

^① 刘道玉:《大学是“学术共同体”》,《书屋》2018年第4期,第51页;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6页。

^② 引自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金力2022年在庆祝复旦建校117周年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综合学科场的致辞,<https://fddi.fudan.edu.cn/c9/8c/c18965a444812/page.htm>,2024-03-30。

统基础上,已将地区主义研究推进到“比较地区主义”新阶段,并主要围绕构建“比较地区主义”新领域、聚焦“地区治理”新议题、深化“地区制度”新认识、转向“全球南方”新主体等内容,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国际学术界基本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拥有庞大的研究人员队伍、固定的研究机构和成果发表平台,并具备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且重视建立和共享数据库资源。具体地,国外相关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新领域。在新千年之交之后不久,国际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世界上的地区主义发展不再是欧洲和欧洲之外这样简单的划分,而是存在着多个“地区世界”(regional worlds),于是努力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以及传统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方法相结合,提出构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新领域的学术任务。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陆续诞生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举五例:一是2005年由新地区主义研究代表人物、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比约恩·赫特内(Björn Hettne)发表的《超越“新”地区主义》,这篇文章最早开始认真反思地区主义研究的迭代问题,对地区主义的新旧之分提出质疑;二是2009年由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研究员菲利普·德·隆巴尔德(Philippe De Lombaerde)等人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比较问题》,该报告从比较政治学视角对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三个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讨论,指出当前分歧和未来方向;三是2012年由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发表的《比较地区主义:这个领域正逢其时?》,该文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成为独立研究领域所必须回答的五大理论问题;四是2016年由著名地区主义学者、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独自撰写的《重新思考地区主义》,该著系统地重新思考地区和地区主义,同时也创造性地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设定了议程;五是2016年由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塔尼亚·博泽尔(Tanja A. Börzel)和托马斯·里塞(Thomas Risse)联袂主编的《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对1990年之后的地区主义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是一本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本里程碑式的重要研究指南。上述这些标志性文献就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研究视野、理论路径、研究方法、议题领域和未来挑战等做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共同搭建起了比较地区

主义的研究纲领和议程,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指出了方向。^①

进入比较地区主义新阶段后,欧美学术界不断反思当代地区主义研究,尤其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甚至掀起创新一体化“大理论”的热潮。比如,2019年,《欧洲公共政策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推出题为“重构21世纪欧洲一体化大理论”的专辑,结合欧元危机、英国“脱欧”、移民危机等欧洲政治经济的最新动态,对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进行检验,进一步确认了地区主义比较研究的重要价值。^②

二是聚焦“地区治理”新议题。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有关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日益兴盛。国际学术界对地区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治理转向”,即从重点关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转向重点关注地区治理。在西方学者看来,“治理”概念抓住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行为体在地区和多层治理的各种不同的‘正式’和‘非正式’联合体、网络及模式当中多样化的联系和互动方式”。^③因此,对于主流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理论而言,“治理”能起到扩大视野与增强解释力的作用,从而在地区主义研究中流行起来。关于地区治理的成果十分丰富,包括:对单一地区的地区治理进行研究,如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教授马克·比森(Mark Beeson)和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合编的《劳特利奇亚洲地区主义手册》、哈佛大学哈佛国际

① Björn He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0, No.4, 2005, pp. 543-571;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The Problem of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Jean Monet 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9, No.7, 2009; Amitav Acharya,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A Field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47, No.1, Special Issue, 2012, pp. 3-15;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2016;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对这些文献的综合述评,参见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16—127页;〔德〕塔尼亚·A.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文前译者导读。另外,更详尽的相关文献述评,可参见索德鲍姆近年在“牛津参考文献”(Oxford Bibliographies)网站上的专题述评文章《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其中列举了更多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代表性文献,并逐一做出评述和总评,对于国内学者全面了解相关国际学术进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参见〔瑞典〕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比较地区主义》,刘晓渊译,耿协峰校,《云大地区研究》2024年第2辑,原文参见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display/document/obo-9780199743292/obo-9780199743292-0301.xml>, 2024-03-20。

②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Grand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6, 2019, pp. 1113-1133;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Grand Theorie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6, 2019, pp. 1231-1252。

③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es of Regionalism,”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31-41。

与地区研究院院长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I. Domínguez)等学者主编的《劳特利奇拉丁美洲世界手册》;对多个议题的地区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如前文提到的博泽尔与里塞主编的《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和德·隆巴尔德主编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手册》;对单一地区内某个议题的地区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索尼娅·卢卡雷利(Sonia Lucarelli)等主编的《欧盟与多边安全治理》。当然,较为集大成的新成果,要数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于尔根·吕兰(Jürgen Rüländ)等主编的《全球治理与地区主义手册》,不仅梳理了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的关系,还重点评析了各个地区、跨地区及其对某个重要政策议题的治理模式与现状。^①

诚然,相关学者也承认,治理并不是一种理论,而只是一种分析框架,方便人们进行系统的和有组织的跨地区比较,因此,综合“治理”和“比较”两个视角的文献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探索全球南方地区卫生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比较分析》《新冠疫情下的东盟和欧盟:克服现实主义的自我实现预言》等^②,它们通过“某一议题的治理+两个地区的比较”得出影响该议题的地区治理效用的模式,此类文献占据绝大多数;还有如《从标准看全球有机农业治理的新地区主义:基于地区的比较》^③此类着眼于“某一议题的治理+多个地区的比较”的作品。由此可见,比较地区主义对地区治理议题领域具有拓宽作用,将研究内容从传统的地区经济贸易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扩展到更广泛的治理领域,充分展示了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议题的丰富性。

①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Jorge I. Domínguez and Ana Covarrubia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 Routledge, 2014;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 *Handbook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4; Sonia Lucarelli, Luk Van Langenhove, and Jan Wouters, eds., *The EU and Multilateral Security Governance*, Routledge, 2012; Jürgen Rüländ and Astrid Carrapatoso, eds., *Handbook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② Giovanni Agostinis and Kevin Parthenay,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Health Governance Modes in the Global Sou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2, 2021, pp. 399-421; Frederick Kliem, “ASEAN and the EU amidst COVID-19: Overcoming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of Realism,” *Asia European Journal*, Vol.19, Issue 3, 2021, pp. 371-389.

③ Sandra Schwindenham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Global Organic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Through Standards: A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8, 2018, pp. 86-105.

三是深化“地区制度”新认识。国外学界关于地区制度的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是地区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只不过相关研究兴趣时起时伏,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后又一度陷入沉寂,直到80年代中期之后重新活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研究者对地区制度的理论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及国际机制论的影响和建构主义主导的“新地区主义方法”上,但前者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上^①,后者则偏于强调非国家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强调地区化进程而非制度本身的作用^②,两者都忽视了对全球各地多样性地区制度的系统比较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际制度研究进展的影响,以阿查亚和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为代表的一批地区主义学者开始更加重视地区制度设计的比较研究,将对地区制度的研究重点从“制度是否重要”转向“制度如何重要”即“制度如何起作用”问题上,并且对欧洲之外的地区制度进行了系统比较。^③他们不仅研究了地区制度的多样性问题,也着重回答地区制度设计上的多样性是否带来合作性质的多样性问题,从而将地区制度研究引向深入。这种对于地区制度设计特征的研究新兴趣,超越了理性主义的方法而充分运用了建构主义和其他方法,有效地提供了对地区制度的新认识。

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者对地区制度的新认识还体现在,他们对地区制度或地区组织的理解从区分“合作”还是“一体化”的程度,转向衡量地区组织权威的授权程度。“共享”和“委托”是他们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分别代表两种制

^① 代表性文献有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 Leonards, NSW: Allen and Unwin, 1994;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Vinod K. Aggarwal, ed.,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A Complex World: Bargaining, Linkages, and Nest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代表性文献有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③ Amitav Achary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Crafting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度设计维度和两种战略动机。^① 据此,他们可以系统考察和比较全球各个地区组织中的权威委托和共享情况,并且将地区制度设计看作关键的独立变量而不再只是依附变量,对其成因和后果分别加以理解和解释,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相关研究的灵活性。^② 此外,地区制度的比较研究还从单纯研究地区制度设计延伸到研究地区争端解决、地区认同和地区共同体、地区制度合法性,以及地区间和跨地区主义等更加广泛深入的内容上。^③

四是转向“全球南方”新主体。国外学界关于全球南方的研究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成果,近十年来更是进展快速,主要围绕各项政策议题深入探讨全球南方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利益和需求。但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地区,基于地缘关系与经济互动等因素,这些国家更愿意通过地区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也积极参与跨地区与地区间的合作,并主张依托地区机制与全球秩序发生关联和互动,所以,从地区主义研究视角考察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的国外文献并不在少数。全球南方研究学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奎琳·安妮·布雷夫博伊-瓦格纳(Jacqueline Anne Braveboy-Wagner)曾于2009年撰写《全球南方的制度》一书,以地区及次地区视角讨论了泛美、泛非、泛阿拉伯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非洲、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制度现状。^④ 其后,越来越多的文献以“南方地区主义”(Southern Regionalisms)、“全球南方地区主义”(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or Global South Regionalism)等为主题或关键词,将全球南方的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置于地区主义研究下进行考察,重点研究了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的相关制度设计,以及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治

① David Lake, “Delegating Divisible Sovereignt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2, No.3, 2007, p. 220;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Delegation and Pool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0, No.3, 2015, pp. 305-328.

② Tobias Lenz and Gary Mark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ibid.*, Chapter 22, pp. 513-537.

③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ibid.*, from Chapter 23 to Chapter 26.

④ Jacqueline Anne Braveboy-Wagner, ed., *Institu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64-209.

理机制。^①而通过比较地区主义视角考察全球南方在某一议题上的地区或地区间治理模式及效用研究更是愈来愈多,并且主要呈现出三种比较形式:地区内部比较、地区外部纵向比较和地区外部横向比较。^②

总之,全球南方成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新主体和新对象,甚至成为其中一片新的“良田沃土”,极大地丰富了其研究内容,也为全球南方的崛起提供了别样生动的诠释。

五是形成日益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已基本形成并持续发展。从研究人员来源看,历经几十年研究,一些综合性的地区主义研究团队享誉国际学界。其中,既有如“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这样影响巨大的专门性机构,还有如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CSGR)、瑞典哥德堡大学地区和全球治理研究小组(REGG)、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全球与跨地区研究研究生院(BGTS)等大学内设机构,也有欧盟资助的庞大的研究协作网络——如GARNET(“有关全球治理、地区化和规制的卓越网络:欧盟的角色”,包含42个研究中心和大学,由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统一协调)和GREEN(“全球秩序重建:通过欧盟网络渐进实现”,拥有16家机构并在欧洲之外也有合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和网络不仅培养和集合了地区主义研究人员,还网罗了来自多个学科背景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极大地丰富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多学科综合

① 相关文献有如 Pia Riggirozzi,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Welfare: Framing and Advocating Pro-poor Norms through Southern Regionalism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2, 2017, pp. 661-675; Ulf Engel and Frank Mattheis, eds., *The Finances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Follow the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20; Shintaro Hamanaka, “Inter-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Comparison With Extra-, Cross-, Trans-, And Pan-Region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6, 2021, pp. 1-23; Tullo Vigevani and Haroldo Ramanzini Junior, “The Challenges for Build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Case of Brazil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Mercosur,” Springer Cham, 2022; Clarissa Correa Neto Ribeiro,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Institutional Mapping of the Scenarios of Overlapping,” in Clarissa Correa Neto Ribeiro, ed., *Overlapping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Coexistence Through Political Crises*, Springer Cham, 2022; Dina Sebastião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Moving from EU-Centrism: Lessons from the Polycrisis for EU Studies and Global South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19, 2023.

② 代表性文献有 Nand C. Bardouille, “Caribbean Regionalisms in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aking of Four Regional Systems,”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43, 2018, pp. 171-211; Brooke Coe and Kathryn Nash, *Regionalize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Mark Beeson and Jolanta Hewitt, “Does Multilateralism Still Matter? ASEAN and the Arctic Counc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lobal Policy*, Vol.13, 2022, pp. 208-218.

性”。尤其值一提的是 2001 年在比利时布鲁日建立的“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其宗旨是对全球的地区一体化活动进行比较研究、监测和评估,并对地区组织与全球性机构之间的互动开展研究。^① 20 余年来,该研究院汇集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组织了至少三个大型联合研究项目(区域和城市治理实验室、地区一体化知识库和区域性公共产品项目),并主持出版年度报告(已出 21 份)、“联合国大学地区主义丛书”(已出 27 种)及各类专著和手册多种,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上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典范重镇。

在研究资源共享方面,国际学术界较为重视建立和共享数据库资源,以支持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同时也为案例研究和定性分析提供数据材料上的充分支撑。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者对共享数据库的利用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依靠现有数据库开展重要案例数据的收集。如利用“国际权威衡量”(MIA)数据集考察地区性组织“权威”的范围和深度、利用“国际环境协定数据库”(IEAs)考察国际环境政治中的地区性协定、利用“流域组织(RBO)制度设计数据库”考察地区内与跨地区水资源管理等。^② 二是在已有数据库及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以衡量地区制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比如,建立“地区组织相似性指标”(ROSI)。^③ 三是建立原创性数据库,用以进行调查分析和内容分析,也方便后来研究者的使用。^④ 四是合作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等新型定量技术对各类

① 参见 UNU-CRIS 官网介绍:<https://cris.unu.edu/aboutus>。

② Gary Marks, et al.,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Volume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Jürg Balsiger and Miriam Prys, “Regional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16, 2016, pp. 239-260; Susanne Schmeier,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Vol.13, 2015, pp. 51-72.

③ Anja Jetschke, et al., “Patterns of (Dis)similarity in the Design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imilarity Index (ROSI),”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22, Issue 2, 2021, pp. 181-200.

④ Diana Panke, et al., *Comparing Reg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Dynamics and Regional Particularities*, Bristol, UK: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Julia Gray and Jonathan B. Slapin, “How Effective Are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Ask the Exper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7, 2012, pp. 309-333; Justine Miller and Samuel Standaert, “Towards an Exhaus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Database,” UNU-CRIS Working Paper, 2023.

地区性安排进行评估。^① 在推动地区主义量化研究及其资源共享方面,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的德·隆巴尔德是学术“先锋”,他曾主持编写《地区一体化的评估和衡量》《地区一体化实用手册:定量和定性方法》等,并参与开发了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的PRARI指标工具包,用以衡量地区卫生治理政策的进展和成效。^②

国际学术共同体离不开学术期刊的平台支持。一直以来,研究世界地区和地区主义的作品分散地发表在大量各不相同的学术期刊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和《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过大量有影响力的特刊和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对地区主义研究的支持力度最大。其他经常发表地区主义研究作品的期刊还包括《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组织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等,这些期刊多讨论地区制度设计、治理效用等理论性问题。而有关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研究的期刊,则会依照本地区特点发表与地区主义相关的学术文章,特别是《共同市场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欧洲公共政策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和《欧洲一体化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等最为明显。另外,《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所刊发的地区主义研究类文章则多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直接相关。

总体而言,国际上的地区主义研究积累早、发展快,业已形成日益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不过,国际学术界的地区主义研究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多为欧美学者,研究内容多以欧洲或欧盟为案例,研究视角长期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作品中往往带有维护欧洲或欧盟作为地区主义“模板”和“范本”的潜在意味;研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念过剩与

^①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Regional Integration Clusters and Optimum Customs Unions: A Machine-Learning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36, 2021, pp. 262-281.

^②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 *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ed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Manual: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London: Routledge, 2011; A. B. Amaya, et al., “Measuring the Progress and Success of Regional Health Policies: PRARI Toolkit of Indicators for the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UNASUR),” The Open University: Milton Keynes, December 2015, <https://cris.unu.edu/measuring-progress-and-success-regional-health-policy-prari-toolkit-indicators-union-south-american>.

不兼容弊病,比如早期地区主义、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等不同时期的研究都对“地区”概念给出过不同定义,形成许多对地区、次地区、微地区、跨地区和地区间关系的研究,这种多样性催生了大量互不兼容但又极为相似的概念,至今没有文献能很好地解释和分辨;评判地区发展的标准存在单一性,制度化程度及政治成果几乎成了评判地区发展的唯一标准,地区发展的“过程”与“关系”等要素近乎被无视,也导致相关文章中的比较维度往往不是很完整。

当然,瑕不掩瑜,国际上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其优势和特点突出,值得中国学者高度关注和学习借鉴。

五、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陈:您讲过,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目标是努力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当前,我国正重点建设区域国别学、全球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它们与地区主义研究的碰撞会产生什么新影响?

耿:我们先谈区域国别学。近年来,区域国别学在我国发展迅速,并已被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相关研讨十分火热,但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和误解。

比如,由于对“region”和“area”两个词的中文译法一直不统一,存在“地区”和“区域”两种译法,而对“regionalism”和“area studies”也相应地各有两种译法——“地区主义”/“区域主义”和“区域研究”/“地区研究”,于是就形成两种术语并行存在的现象,学界也基本默认这两种译法的含义等同,只是各依自己方便来择一使用或混合兼用。^①从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来看,使用“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对比较多一些,尽管混合使用仍很常见。对此,希望今后在书面使用中能够更加注重规范、局部统一。

诚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二者在研究属性和内容上的联系与区别。首先,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地区主义研究(regionalism study)是指针对世界上地区层次或地区空间范围的

^①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地区主义研究中所说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y),与“区域研究”/“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又有所不同,二者关系也“一直纠缠不清”,前者“以理论见长”而后者“以实证研究为主”。参见贺之杲:《欧洲一体化研究:西方叙事与中国视角》,《欧洲研究》2023年第5期,第139页。

合作、一体化和治理活动而开展的综合性研究,从学科属性上看,它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区域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则是指针对世界各个地区及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分别开展的专门性研究,从学科属性上看,它具有更加明显的多学科交叉性质。更具体而言,这两个领域虽然都以“地区”(region)或“区域”(area)为研究客体,但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区域国别学关注的往往是个别地区及其中的不同国家,致力于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增进知识,研究对象主要是当地的语言、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通常采用的是“解剖麻雀式”的方法,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角度进行专门化研究;而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研究对象主要是地区层次的国际制度建设或地区性的合作与一体化现象,研究方法通常是社会科学的演绎和归纳,即“全面调查式”的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方法。从研究目的来看,区域国别学以掌握地区或区域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为主要任务,重视当地性和本土性,旨在把握现状,客观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其本土特征;而地区主义研究侧重探究地区性(regionness)和地区关系,重视研究地区或区域内外的互动关系模式和发展趋势,旨在改变现状,推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体建构和塑造。

其次,两者间又有着越来越显著的互动兼容,两者关系呈现出“共变”(co-evolution)与“协进”(coadvance)的发展特征。所谓“共变”是指它们在共同演变、共同进化,而“协进”是指它们在携手前进、协同进步。其中,“共变”体现在21世纪初它们各自发生的研究转向上。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出现“三大转向”,分别是“学科转向”“全球转向”和“比较转向”。“学科转向”是指,区域国别学在近年才被列为一级学科,此前很长时间内“与社会科学学科基本上是互相脱离的”,^①连国际学术界也只是近年来才大力主张将其与学科视角进行“创造性综合”。^②“全球转向”是指在当今全球问题无处不在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区域研究学者大多主张,区域国别学建设应该研究“跨学科、跨地域、跨国家、

①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迈向新的综合?》,周雨晨译,刘丰译审,《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95页。

跨文化、跨族群的互动关系”，^①主张“让学科发展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平衡性”。^②因此，其全球转向的姿态也很分明。“比较转向”是指区域研究学者开始注意到，“开展比较区域研究能够从学科基础、方法和视野等方面连接起区域研究和学科”，^③是提高区域研究的学理水平的有效路径。^④另一方面，地区主义研究也出现了“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这样“三大转向”（前文已述）。由此可见，这两个领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共变”特征。

两个领域的“协进”特征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地区/区域”概念的认识和分析是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结合点和共识基础。两个领域的代表学者都认为，地区或区域是一种“社会建构”^⑤或者“有延展性的人为建构”；^⑥中国学界有著名学者甚至以构建“国际区域学”为名对“区域（地区）”专门进行新的理论解读^⑦，更有助于加强和加深两个领域对这一概念的共同理解和使用。第二，当前最突出的两个“协进”方向分别是“比较转向”和“交叉融合”。“比较转向”已如前述，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交叉融合”主要是学科理论意义上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是对于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中，特别需要从区域国别学中汲取新鲜知识和经验养分，甚至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⑧而区域国别学需要交叉的学科更多，除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外，还需要综合历史与文化领域的学科知识，并且也需要从地区主义研究中汲取理论构建的活力，甚至把地区主义研究视为“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⑨当前，两个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协进”任务是，如何构建既能“理论化”中国的地区实践、又有着普遍解释力

①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② 杨丹主编：《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年版。

③ 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2018 年第 6 期，第 153 页。

④ 曾向红：《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9—37 页。

⑤ 〔德〕塔尼亚·A. 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前引书，第 7 页。

⑥ 〔德〕帕特里克·克尔纳等：《比较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张紫昕、刘丰译，《云大地区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98 页。

⑦ 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⑧ 王志：《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兼论比较地区主义的作用》，《世界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第 203 页。

⑨ 李晨阳：《再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8 期，第 73 页。

的概念和理论。^①

再谈一下全球学。中国的全球学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也正式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并逐步具有较为严谨、规范的独立(交叉)学科性质。^②进入21世纪,全球学与地区主义研究几乎同时迈入起飞期或高速发展阶段,它们的学术发展史与中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地区化两大实践进程高度关联,正是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与互动,决定着中国的全球学和地区主义研究在互动交融中不断向前发展。

从互动角度看,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受全球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全球转向”趋势。从创生之初,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者就高度重视地区合作的全球性,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观念,主张摒弃各种封闭性的旧地区主义而倡导新地区主义,主张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架起新地区主义的桥梁。^③如今,受全球学及其相关学科如全球史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等影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又出现“全球转向”,提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主义”,倡导“全球性地区治理”新观念。^④与此同时,全球学从严格强调整体治理走向更加重视深度治理,更加重视“全球—地区”(或“全球—地方”)的治理联结和多层次复合治理,其中,一个更加突出的趋势是出现“区域转向”。^⑤总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转向”与全球学的“区域转向”在相互参照与互动中几乎同时发生,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景观中的一个新面貌。

① 王志:《比较地区主义:区域国别研究新思路——兼论中国学者的视角和贡献》,《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59—70页;王志:《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兼论比较地区主义的作用》,上引文,第192—209页。

② 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王学玉:《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36—40页;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第23—30页。

④ 魏玲:《全球转向下的比较地区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36—147页;徐秀军、沈陈:《中国视角下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28—135页;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16—127页;耿协峰:《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践路径: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4期,第80—105页。

⑤ 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41—165页;郑先武:《全球治理的区域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50—60页;陈翔:《“回归区域”? :理解全球安全治理区域化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55—83页;李博一、黄德凯:《新形势下的国际治理:区域转向与中国方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6期,第71—96页;刘雪莲、唐新宇:《全球治理转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第92—101页。

从交融角度看,上述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是相互融入和交汇、相互建构和成就。全球学日益强调“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导向,而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地区主义研究更是强调超越“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尊重每个地区的本土传统,主张无一例外地进行全球比较,主张发挥非国家行为体促进地区合作的积极作用。因此,两者无论在理论路径还是方法论上都日益交汇兼容。^①

陈:面对国际上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您如何看待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耿: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应当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在过去 30 年积累的成果基础上,结合当前全球学和区域国别学等新兴领域的学术发展需求,继续沿着以下几个主要方向努力推进。

其一,确立全球视野,高度重视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主义导向。一方面,要加强全球主义视野的历史研究,借鉴全球学和全球史学的思想,不断发掘地区主义的历史模式和本土规范,在尊重世界各个地区传统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于地区主义发展的全球进程的认识;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实践中,全球主义、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间,或者说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之间,并不会很容易地协调平衡发展,尤其需要预防其“暗面”,既包括各类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也包括逆全球化和逆地区化。在全球化进程受挫和大地缘博弈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既要防止落入大国冲突与对抗的各类“陷阱”,也要特别警惕有些国家以地区化名义行逆全球化之实,或者以全球化名义行逆地区化之实。未来,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需要在重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主义”或“全球性地区治理”观念的基础上,平等对待世界各个地区,尊重世界治理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多层性,紧紧围绕与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都相关的各个议题领域,开展更大规模的实证研究。

其二,创新理论建构,规范研究方法。在理论创新上,需要借鉴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等学科进行学术交叉和综合的思路,不断提出跨学科性的新观念、新范式和新路径,为弥合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之间的传统

^① 耿协峰:《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学:在互动交融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第 A04 版。

区隔做出贡献。在方法规范化上,需要借鉴学术界日益对比较地区主义和比较区域研究的重视,深化对亚洲和全球(尤其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并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另外,为促进对世界上地区主义发展演变认识更加全面深入,还有必要重点引入除传统的制度主义—功能分析、建构主义—规范分析以外的“政策扩散”分析视角。比如,托马斯·里塞特别倡导的比较地区主义“扩散机制论”,冀能给我们认识地区主义的发展演变提供更好的分析工具,也可对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更精细的考察。^①

其三,关联现实进程,当前尤其要注重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南方研究的结合。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全球南方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相关学术研究也变成“热门”。如何加强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的合作,也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亟须重视和解决的现实课题。通过比较地区主义视角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强化对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的理解和解释,不失为一条重要研究路径。当前,全球南方的地区合作机制丰富而活跃,地区内、地区间和跨地区的合作机制层出不穷,中国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包括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阿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等。因此,将全球南方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置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视角下加以考察,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比较地区主义学者高度重视和加强的研究方向。为此,可以考虑在借鉴国际同行成果的基础上,将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南方研究结合起来,构建新的交叉研究议程。

概言之,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不仅要“看清来路”——理清已有研究的脉络和纹理,还要“看到出路”——规划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蓝图。今后,中国地区主义研究者需要积极践行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增进中外学术交流,并结合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合作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地区间合作的实践进程,大力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同步发展繁荣。

^① 耿协峰:《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4期,第80—105页。